

← (上接13版)

访中,师生们都直言条件艰苦。由于水土不服,当地蝇患、鼠患严重,所有成员都得了细菌性痢疾,为此,阮仪三特地上太原请医生来给大家看病。“虽然困难,但我们并不太在意,毕竟平遥本身太震撼了,太让人兴奋了!”张庭伟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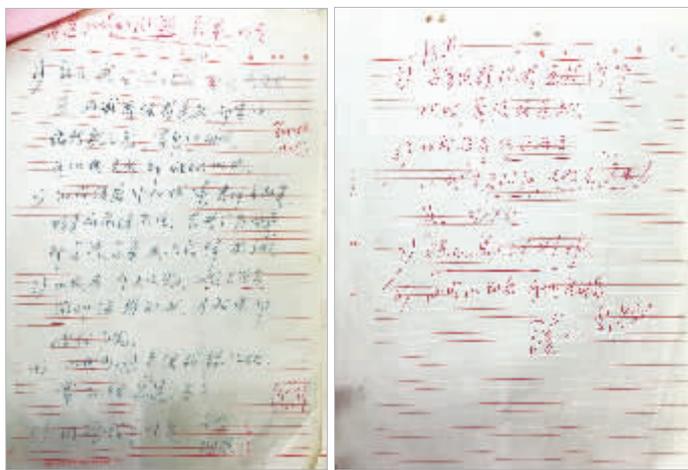
测绘以后,阮仪三和张庭伟等开始制定规划。在阮仪三家中,至今保存着一张珍贵的手稿,那是1981年他带队出发前,系里前辈陈从周教授写给他的。当时,他去请教陈先生平遥的规划该怎么做,陈先生“边说边写”了8条建议,其中最后一条成了平遥规划的纲领——“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于是,与当时全国大多数古城规划普遍拆旧城、建新城不同,受平遥县政府委托,阮仪三、张庭伟等共同编写了《平遥县城总体规划》,制定了“在旧城外开辟新城”的规划方案:河西旧城区与河东新城区相对独立,新旧之间有一桥(九眼桥)相连,又用一河(惠济河)相隔。张庭伟记得,当时他俩连夜绘制了古城透视图,还用硬纸板做了一个简单的城市模型给当地领导看。当大家看到在保存旧貌的古城以外,有一片现代楼宇的新城都很高兴。同济师生帮助平遥制定规划一事,登上了当年《山西日报》的头版。

在1983年6月平遥县建

在阮仪三和张庭伟等编制的规划方案中,详细叙述了关于“古城墙、古城区保护规划”,提出要“整旧如旧”、“保护城墙周围环境”等。“平遥的城墙太值得好好保护了!”阮仪三说,平遥城墙建立于后周时期,全长6157.7米,墙高10米,每隔40至100米筑有马面,即墙上向外突出的墩台,可供瞭望和发挥侧射火力;马面上设窝铺,即在马面墙顶上建造的小屋,供士兵避风雨、藏兵器。“平遥城墙共有马面、窝铺72个,城垛、垛口3000个,象征孔子七十二贤和三千弟子,这多有寓意啊!”平遥当地居民告诉记者,1977年闹洪灾时,古城墙发挥了作用,挡住了洪水,人们纷纷爬上城墙“看海”。为了保护修复好城墙,刚向县领导汇报完规划方案的阮仪三,带上图纸连夜从平遥直奔北京,向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先生、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寻求支持。最后,他争取到了8万元“巨款”作为修缮城墙的保护经费,并派学生李晓江先后“驻守”北京、太原、平遥,实时汇报这笔款项的发放和使用情况。

经过多方多年努力,1986年12月29日,国务院公布平遥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当年,《China Daily》(《中国日报》)海外版以“Traditional lives behind city wall”(在城墙后的传统生活)为题,向外国人介绍了平遥。



陈从周先生手迹,提出对平遥的保护规划模式为“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本版均阮仪三供图)

委王中良的《山西省平遥县古城保护规划初析》一文中写道:“根据城市特点和综合分析,平遥县城性质应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具有完整古城风貌的旅游县城”,“是具有南方气息的典型北方名城”。这份规划的年限被定义为“近期为1985年,远期为2000年”。而在1980年代当地的报告中,也对1976版的旧方案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时“这样的规划及做法,其结果必然使很有特点的平遥县城变成没有特色的一般性县城”。

## 开创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遗”的先河

1987年,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接编制了《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项目主持人是现任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时任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设计室副主任的李锦生。李锦生是平遥人,1983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



平遥古城保护规划团队合影,1981年8月摄于平遥清虚观

后排左起:张伟、任雨来、苏功洲、李祖孝(已故)、阮仪三、张庭伟、李有华(已故)、于一丁、沈毅

前排左起:吴志强、吴晓勤、李伟利、史小予、熊鲁霞、刘晓红(已故)

其中任雨来、李祖孝、李有华为平遥文物所干部,其他均为同济师生

学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后回山西城市规划设计院工作。

李锦生告诉记者,为编制这份规划,项目组历时一年,对平遥古城全城近4000座院落、几万幢房屋进行了逐一普查,并翻阅了全部院落的档案资料。“我们对每一座建筑的质量现状、历史文化价值、建筑保护措施、产权状况,甚至每座院落的门牌号码、院内居住户数、人口结构等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记录。”迄今为止,李锦生是跑遍每一个院子的唯一人,他说,由于清代中后期平遥作为票号中心,富裕人家建了不少高质量的房屋,项目组调研后发现这些明清时期造的老房子整体保存不错。综合考虑砖、土、木以及“目字形”院落格局等体现平遥传统民居风貌特征的因素,项目组在古城内筛选出有较高文化价值、历史遗存较完整的院落400余座。在调研后,项目组又将整个古城划分为28个片区,对每个片区的房屋质量、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居住人口等指标赋予权重并进行打分,得出了每个片区的人居环境质量值。李锦生说,当时就是以这个打分为基础制定的保护规划和发展策略,规划方案从1987年一直应用到今天,主要包括综合治理、街道硬化、重要院落及寺庙的保护维修等。武汉城建学院的王国恩、丁建民参加了这项工作,阮仪三当时带教的硕士研究生、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也参与其中。

阮仪三告诉记者,从1980年代末起,国家建设部委托同济规划办过几期面向各省市规划系统人才的培训班,阮仪三负责的是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与保护的培训。“我们就请平遥当地派3个人来参加培训班,考虑到当地财政困难,学习经费都由我们承担。”他说,当时一期培训时长3个月,除了理论教学,还带学员们到上海周边地区参与了规划实践,“我想,这会对他们有帮助的”。

后来,在各方努力下,1992年6月6日至15日,国家建设部和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平遥举

办了古城保护规划培训班,邀请联合国人居中心的专家巴克莱·琼斯(美)、卡尼·阿斯(加)和弗莱明·阿罗德(丹麦)等担纲主讲。根据2007年6月山西人民(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实录平遥申遗》一书中,在“申遗”期间任平遥县县长的刘志杰回忆,当巴克莱·琼斯在授课中讲到,南斯拉夫的杜布洛尼古城有600多年历史,虽经过一次地震但保护完好,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便有学员提问道:平遥可不可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琼斯说,按他的看法可以。学员又问: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何办理?琼斯回答,国家申报、专家考察、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全委会通过。刘志杰写道:“从此,人们头脑里不仅有了世界遗产这一概念,也产生了申报的意愿。”

阮仪三告诉记者,此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的相关专家和国家建设部有关领导,确实就平遥“申遗”一事展开讨论。在听取报告阶段,他为平遥做了汇报。不过,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整座城市“申遗”的先例,大家心里有些没底。另外,普通百姓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并不高,对于“申遗”能不能得到平遥当地群众的支持,大家有些疑虑。阮仪三记得,时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郑孝燮先生力排众议:“这不是当地的事,这是我们国家对世界的贡献。”

1994年,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二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平遥旅游经济开发论证会,第一次移师平遥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提出,应争取将平遥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会议最后一天,6月9日,在平遥古城下东门点将台上,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了《关于支持尽快向联合国申报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倡议书》。由此,平遥的“申遗”准备正式拉开帷幕。

“平遥的‘申遗’筹备,花了足足3年。要说里边的故事,我可以讲三天三夜不带重复的。”冀太平说。据《实录平遥申遗》

一书记载,针对古城内电视天线密如蛛网、乱似枯枝的现象,县广播电视中心和城建监察大队接到任务,要在半个月拆除这些电线。为此,这两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早、午、晚各家都有人的时候上门,中午无法休息,晚上还要“突击”。他们不仅必须爬上屋顶高墙拆电线,还要走家串户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部分天线都及时拆除,还有居民自己动手拆解自家的天线。后来,广电中心又及时架起有线电视,使大家看上了电视。1997年春节前,建设局城建监察大队用20天时间对古城内40余处重点院落进行了集中整治,拆除部分院内违章搭建,并修补破墙断壁。在最后的“冲刺”阶段,5年里往平遥跑了100多次的原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曹昌智为了准备提交给联合国的宣传片,不仅自己撰写了脚本,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一起摄影、剪辑、录音。为了选择合适的摄影角度,他曾踩着用绳索捆绑在一起的残缺木梯爬上陡峭的屋顶,险些摔下来;还曾爬上几十米高的水塔,站在悬挑的平台上拍摄古城全景。

1997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国际古遗址理事会专家、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田中淡博士到平遥专题实地考察评估,时任山西省规划院院长的李锦生以平遥古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陪同了考察。在考察之后的汇报会上,李锦生作为主要汇报人,介绍了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和保护规划。他记得,田中先生听完陈述,对两个问题尤为关注,一是平遥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着重体现在古城的完整性和时期代表性;二是平遥下一步的保护措施,主要是对遗产的保护技术与保护手段要有较高的科学性、可行性,以及遗产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性,特别是要有具体的保护政策和措施。

田中淡离开后,经过大半年的等待,1997年12月3日,